

汉语欧化过程中的日语因素

陈力卫

汉语的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西语俄语的,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传递的,当然还有哪些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日文的,这三种渠道应该分别阐述才好,特别是后两种,早应引起我们的注意。

一般我们提起日语对汉语的影响,多偏重词语方面的因素,即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。而且现在朝这方面做的人也越来越多,成果显著,蔚为大观。相比之下,日语对汉语语法乃至文体的影响,这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后,甚至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。我们既然承认有那么多的日语借词,而为何对语法及文体上的影响却熟视无睹呢?

看了一些有关汉语文体的研究,才知道这方面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一条,首先拿王力的《中国语法理论》(1944)作研究的起点,然后就拿胡适以来提倡的白话文加以分析,特别对其中的英文转换汉语时出现的现象着墨甚多,也就是所谓的汉语欧化研究。比如,近来的《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》(贺阳,2008)也是从来华传教士的文体直接跳到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那里,就好像汉语近代文体的形成就只有来自西语的欧化这一条线似的。但是,我们知道这种思路的展开从文化交流史上来说是有点问题的,即中日之间的近代交流这一环完全被忽略了,或者说完全被日语借词这一现象所掩盖了,不去关心其他语言现象的相互影响。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:所谓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西语俄语的,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传递的,当然还有哪些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日文的?这三种渠道应该分别阐述才好,特别是后两种,早应引起我们的注意,京都大学教授高田时雄在《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》(狭间直树编,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,2001)一书的语言史部分的引言中就特意指出过:“欧洲语言的影响不限于中文,明治以后的日文也同样受其影响,文体上的中日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应予以加强。”

那么我们回望时代背景时也会发现,日文的文体改革意识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萌发,真正起步在1880年代,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,前后整整花了60年多年的时间才算完成。在日



梁启超《和文汉读法》励志会增补本,沈翔云编印,1900年7月发行。据夏晓虹教授考证,《和文汉读法》首版应刊行于1900年,在日本印刷,但传入国内后的各种版本均未署撰著人姓名。



梁启超《和文汉读法》增订第三版,辛丑(1901年)八月无锡丁氏畴隐庐石印本



本的所谓言文一致运动中,和文体·汉文体·欧文翻译体的融合成为重要课题,也就是说,日语文体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是:汉文体的改造与翻译体的吸收。

日本早期的欧文翻译并非直译,而是用汉文体来意译。“《花柳春话》(1878)出现以后的翻译体的主流是汉文直译体,随之而起的政治小说也大多以汉文直译体为主轴”(山本正秀《第十五章 翻译文体的对读》,《近代文体发生史的研究》,岩波书店,1965),由此我们能够理解《佳人之奇遇》之所以可以迅速由日文翻译为中文正是因其文体最为适用于梁启超《和文汉读法》的规则。

日文里真正导入欧文直

译体是明治20年(1887)以后,即在汉文体的基础上引入欧文直译体,注重欧文表达的逐字翻译。这种欧文直译体虽然生硬,且有些地方无视日语规范文体中的格的位置,但是采用这种文体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文体“严谨精微”的周密性。这种文体经由森田思轩揉合成一种“外形与内容并重的周密文体”后,德富苏峰主办的《国民之友》杂志(1887—1898)便成了这一文体的主要阵地。

在这一过程中,特别是所谓的欧化语言的影响问题上,日语的欧文翻译体的特征实际上与汉语讨论的问题是一致的,山本正秀(《西洋文学の日本文体に及ぼした影響》,《言文一致の歴史論考》,桜楓

社,1971)主要举出以下几点特征:

1. 翻译新词,如“社会、理想、自由”等;
2. 接头、接尾词的发达,如“泛太平洋、非合理性、超特急、反战、妥当性、自然主义、近代化”等;
3. 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,如:彼 he,彼女 she;
4. 添加动词:“尊敬を払う pay”“注目に値する worth…ing”“…を見出し出した found”“理解をもつ have”;
5. 语法上的欧化主要表现在被动态,进行时,使役态,关系代词,无人称代词,形容词的比较级,主语多用等现象上;
6. 来自英文的新的表达:“換言すれば in other”“ある意味では in a sense”等;
7. 修辞法:拟人法,倒装句,感叹句的多用;
8. 标点符号的健全。

日本当时在对译英语时,也是采用的汉文训读体,这样一来,通过翻译反映在日文中的这些特征,实际上在形式上更便于被中文接受,我们只要看看中文里“值得关注/注意……”这一表述都是出现在民国以后,就会发现上述现象都是与汉语中的欧化问题一脉相通的。

黎锦熙的《国语运动史纲》(商务印书馆,1934)是把白话文与欧化文分开表述的,前者说的是“民国六七年新文学运动初期所谓‘白话’,这种白话,是已经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,已经产生了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这些‘活文学’作品,所以当时一声呐喊,全国的学士大夫,自然而然都‘不学而能’地写得出从没写过的‘白话文’来”,就好像白话文运动在胡适倡导下,经陈独秀《新青年》上的呼应,然后就有鲁迅《狂人日记》的对表,短短几年就算完成了似的。后者则是“新文学运动以后到现在逐渐流行的‘欧化的语体文’,……如‘经济困难’,于古于俗皆无征,完全是二三十年来自日本输入的,……我曾雇一车夫,他常问我的一句话:‘回头我没有来接您的必要吧?’这真是‘欧

化的大众语’了”。他总结说前者的“白话”可写成“文”却不能说,而后者的“欧化的语体文”则有转向说的可能,即为言文一致的途径之一。

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十多年间,可谓中日文化交往最为频繁的时代,亦有“中日黄金十年”之说以印证当时的两国间的交流情形。我过去在《汉语大词典》在处理日语借词上的几个问题》(《日语研究》第2辑,商务印书馆,2004)一文中曾指出过这一现象带来的语言问题:

日本明治维新以后,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。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、文学家以及科学家等都曾在日本留学,汲取知识,并将之介绍到中国来。郭沫若就曾说过:“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。”“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。”(《桌子的跳舞》,《创造月刊》第一卷第11期,1928.5.1)从文学上来证实这一点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,这里我想关心的是语言上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知道,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定义为: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,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,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。”而所谓“现代白话文著作”的作家们多是那些经历了日本留学的人,他们写的文章中如果大量使用了日本式汉语,那么我们也只好当做“规范”予以接受了。

这一背景下,语词的借贷似乎多引人注目,除了大家议论纷纷的新名词外,比如鲁迅的作品里,量词的用法也几乎是沿袭日语的用法,大原信一曾举一个“匹”的例子,指出其在鲁迅作品里的使用范围是超出现代汉语的规范用法的,如从大动物到小虫蚁都可以使用“匹”做量词。但在文体上,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梁启超的“新民体”的形成与德富苏峰的文体之间的密切关系(大原信一《梁启超与日语》,《近代中国のことばと文字》20—40页,东方书店,1994),而德富苏峰的问题又可上溯到“严谨精微”的欧文体。

(下转4版) ➔